

走出
阴影
系列

智商的误区

——献给关注过弱智人的人们

ZHI SHANG DE WU QU

中国目前有1070万弱智人，其规模相当于中东地区的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中国国民的整体素质决定了中国弱智人的特点：自卫性地撒谎、自卑、回避陌生人……该书呼吁每一位公民，当你指责与嘲讽一个弱智人的错误时，请不要忘记你对社会的责任。

航 鹰 维 佳 著
青岛出版社

残疾人中最悲哀的是弱智人，这种悲哀在于他意识不到自己的残疾，而富有善良的人们也意识不到他的残疾。

——一位作家的话

弱智人的知己

(代前言)

航 鹰

1

1990年,我受天津市政府委托写了一部表现民政福利、社区服务题材的电视系列剧本《暖流》,4部戏共12集,主题均是呼吁人际关系之间的和谐仁爱,富有浓郁的人道主义色彩。在拍摄之前,为了提高剧本质量、广泛征求意见,我们给国家民政部、天津市有关负责人和各区政府送去了剧本。因为其中一部戏《启明星》是反映残疾儿童生活的,也给中国残疾人联合会送去了一套剧本。

当时,我没有料到邓朴方会亲自看这么厚的一摞剧本。

后来正式采访,我好奇地追问邓朴方看剧本时的细节。他笑道:“剧本写得很好,一看就被吸引住了,我白天看,晚上也看。”“因为跟我们残疾人关系密切,我看得很认真,也很激动。”“我们一直想找个好本子,总是在寻找。谢晋导演也早有此意,他想拍一部弱智人的戏的愿望特别强烈。他说过,实在找不到好本子,就拍他和两个弱智儿子的真实故事……看中《启明星》,大家是一拍即合。”

听了他的一番话,我才恍然大悟,并相信了“机缘”二字。一些不肯在写作上下笨功夫的人总是说我这个人“会攀”、“能折腾”,那就高估了我的活动能量了。须知,客观条件不成熟,机遇不凑巧,再

怎么折腾也是枉然。我只是承认自己运气好，不知为何常能遇到好机会，连蒋子龙都说我是“文坛福将”。

崔乃夫部长和邓朴方等 20 多位“天兵天将”专程赴津参加《暖流》开机典礼，着实把我吓了一跳。

那天，在天津迎宾馆二号楼，我第一次见到了邓朴方。初次印象，是他身上存在着的种种强烈的反差：他的满脸福相和惨遭重残的不幸命运之间的不协调；他那魁梧的臂膀和瘫在轮椅上的腰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尤其令人意外的是，他的朴实温和、平易近人，和传闻中的“贵公子”几乎对不上号。我仔细端详了这位大名鼎鼎的新闻人物，他的相貌很符合中国人评价男子汉的审美标准：方面大耳，鼻直口阔，剑眉高挑，双目有神。眼角的弧线很独特，高高扬起，煞是威武，又圆又亮的大眼睛透着善良和灵慧。由于他总是得坐着仰视别人，目光中总显得有某种询问与好奇的天真韵味。他笑起来嘴巴大张给人的感觉是开心之至，谈笑中歪斜着右嘴角显得有些……调皮。他老远地朝你伸出了大手，使你一下子就觉得这是个值得信赖的人。

2

我和李玉林采访邓朴方那一天，天气很热，我穿着短衫短裙还直冒汗，却见邓朴方穿着厚厚的深蓝色毛料裤，裤脚下面还露出内套的毛裤腿。工作人员把他从轮椅抬到沙发上落座时，他请小周帮他把毛裤抻平，小周告诉他：“已经抻平啦！”

我听了心中一沉，残酷的事实再一次提醒我，他的双腿已毫无知觉！我不由得捏了一下自己的腿，作为健全人无论如何难以体会到高位截瘫是怎么回事，“无感觉”是一种什么感觉？麻木？虚空？沉重？悬浮？不知究竟该怎样形容。他自己曾对父亲说过一句令人心酸落泪的话：1971 年，邓小平同志在江西软禁地惊悉

儿子被迫害摔伤已瘫痪好几年，给毛主席写信获准将重残的儿子接到身边照料。江西天气炎热，朴方每天洗澡翻身的沉重护理工作，由父亲来承担，每一次都要把父亲累出一身大汗。儿子大了，不好意思赤身见妈妈，只好由全家人把胖子（朴方乳名）抬进洗澡间，爸爸温暖的双手一遍又一遍抚摸着儿子的肌肤，用力揉搓儿子的腰腿，心中尚存帮他恢复知觉的一线希望。朴方却比划着告诉爸爸：“从胸口往下，都不是我的了，我成了半截啦！”蒙蒙蒸汽似乎也不忍听到这悲惨的形容，轻纱般地升起一道雾幔，遮住了年已古稀的老父亲的面庞，让儿子分不清哪儿是爸爸脸上的汗水，哪儿是爸爸眼中的晶莹……

1968年，邓朴方是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学生，年方24岁。作为“中国二号走资派”的儿子在那株连九族的封建专制岁月，身陷“四人帮”重重堡垒更是首当其冲倍受摧残。

那场浩劫中有不计其数的自杀者和被害者，邓朴方是其中大难不死的幸存者。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本活教材，时时令人想起“文化大革命”的死难者，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陈毅、罗瑞卿等，还有那些为数更多的普通无辜者……人民纪念他们，为他们惋惜。但是，随着岁月的久远，年轻一代对那段历史缺少了切身感受，年长人们的记忆力难免褪色。鲁迅先生曾经悲愤地诘问造物主：“暗暗地使生物衰亡，却不敢长存一切尸体；暗暗地使人类流血，却不敢使血色永远鲜浓；暗暗地使人类受苦，却不敢使人类永远记得。”坐在轮椅上到处奔走呼号的邓朴方，以活生生的形象启迪人们的反思，唤醒人们的记忆，激发人们对极“左”势力卷土重来的警惕。

每当我见到邓朴方，眼前总是浮现出一幅“定格”镜头，当年曾经是那样健美灵活青春形象镌刻在那张历史残页上了。

从邓朴方摔成重残到他父亲重新出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经历了漫长的12年，4380多个日日夜夜。他拖着残体顽强地活着、盼着。在他刚摔伤时，如果及时治疗，病情不至于恶化到高位截瘫的

程度,但那时哪家医院会为“中国二号走资派”的儿子好好治疗呢?他独自一人躺在北京清河救济院又脏又臭的病床上,发着高烧全身滚烫,为了赚几个零用钱还要编织篮子。1971年9月,林彪折戟沉沙之后,邓小平、卓琳夫妇再次写信给党中央、毛主席,请求给邓朴方治病。周恩来总理指示让邓朴方住院治疗,却受到“四人帮”一伙的阻挠破坏,治病的时机一误再误。

在采访中,作家的职业性使我不得不向他提了一个近乎残酷的问题:“受了那么多罪,熬了那么多年,有没有死的念头?”

他坦然回答:“人也很怪,到了那一步,完全没有希望时,就心如死灰了,不管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都不再觉得痛苦,只有还存在希望时才会有痛苦。什么都没有了,对一切也就无所谓了,再也没有产生过那种念头。”

这番话充分说明了当年他陷入了怎样的绝境。他能够顽强地存活下来真是奇迹,只有具备超出常人的坚强毅力,才能够战胜漫漫长夜中的绝望孤独和疾病折磨,迎来辉煌的新时期。

3

李瑞环同志曾赞叹:“朴方在人生道路上准确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这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的。”

这一评价贴切极了,尤其一个“找”字说得十分精彩。确实,投身中国的人道主义社会福利事业,是邓朴方在充分了解自身条件,并分析了国际、国内社会发展的需要之后,为自己找到的有所作为的位置。如果不是严重残疾,这位自少年参加北京中学生数学竞赛的数学尖子,凭着真才实学考上北大技术物理系的高材生,本该在高科技领域为国家做贡献。但是,命运使他永远不能站立起来了,后半生该怎样活着呢?凭着他父亲的崇高威望,凭着他的几个学有所成的弟弟、妹妹的照顾,甚至他本可以靠国家补贴和亲人帮助过

悠闲的疗养生活。但是，他是个爱祖国、爱人民的热血汉子，很想最大限度地发出自己一份光和热。于是，他找了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从无到有创办了中国自己的康复中心、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这一功德无量的选择起于80年代初，是在他又一次从死神那里挣脱回来不久。

1979年，邓朴方的脊柱再度骨折，中国医生表示爱莫能助。面临生命危险，他不得不于转年去加拿大治病。加拿大医生阿姆斯特朗、华人医生吴稚康、美国医生玛克恩等专家，先后为他做了三四次手术。先是把两根长30厘米、直径四毫米的“哈氏棒”和八只钢爪固定在他的体内，又取出他的左腿腓骨做植骨，再用钢板螺丝钉固定脊椎。两次大手术中出血很多，先后有10000多毫升加拿大人的鲜血输进了他的血管。经过了反反复复的抢救治疗，他才脱离了生命危险，但只能躺着。至于阿姆斯特朗来到中国为他植入“钢筋铁骨”，使他能够坐起来，那又是后话了。

在加拿大治疗期间，为了省钱，手术后不久他就搬回中国驻加拿大使馆，身子罩着一个硬塑料支架，一动不动地躺了两个月，眼睛只能望着天花板。由于只能吃流质食物，他饿得只剩下了皮包骨，然而他那宽阔的额头里智慧的大脑却在紧张地思考着，设计着，憧憬着……

当时，中国社会正在面临一场深刻的变革，举世闻名的三中全会以后，百废待兴，改革开放的大潮已经发出最初的涛声。远在异国他乡的邓朴方的残躯虽然只能仰面躺着，但他的心却再也躺不住了。

在阿姆斯特朗医生的热心安排下，加拿大康复中心的院长两次来函邀请邓朴方进行免费康复，但邓朴方希望马上回国。连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都来挽留他，也未能改变他飞回祖国的决心。就这样，1981年初春，他躺在担架上回到了故乡热土。虽然春寒料峭，

大地却已解冻苏醒，孕育着绿的生机。

邓朴方所以不顾个人康复急急返乡，是要把在国外了解到的康复医学的观念、康复系统工程介绍到中国，创办自己的康复中心，为同胞中几千万残疾人造福。康复医学，在我国还很陌生。开始，没有办公地点，他就自己家里躺在病床上和人们讨论。没有经费，甚至连办公用的纸张用具都没有，有一位朋友捐赠5000元，买了最初的办公用具。

中国的康复中心，和后来遍布全国的伤残人康复机构：残疾人联合会、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残疾人运动会、残疾人艺术团……就是这样从邓朴方的病床飞到了大地上。

当我写这篇文章时，电视屏幕上正在播放邓朴方在联合国大会上讲话的新闻，望着他那一贯的端坐的身影，只有朋友们才知道由于“钢筋铁骨”的固定支撑，使他无法弯腰，只能不舒服地仰面而坐，这种看上去气宇轩昂的样子坐在联合国的中国席位上倒是蛮合适的。这时，我又想到了李瑞环同志对他的评价，确实，他找到了自己的最佳位置。

我曾以山东人的直率，当面对邓朴方说：“作为一个高干子弟，如果你没有残，可能会做什么高官。但是，你个人的声望，绝对没有现在这样世界性的影响。当官，也许本人很有能力，但老百姓总会有许多说法，认为沾了什么光。借了家庭背景的光，个人能力却又被那种背景抹杀了。所以，我认为你的不幸反而是你的大幸，中国需要你这样的慈善家。你们靠自己创立起来的事业，在国内外取得了越来越大的名声，甚至比不残更有影响。”

是啊，令人惋惜的英才！尽管我们常爱引用孟子的名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但是，邓朴方所受的筋骨体肤之苦也太残酷了！况且，至今并非所有的人都把他所献身的人道主义社会福利事业看作是崇高“大任”。

由于我国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健全人的温饱问题刚刚解决，在人们的意识中，对残疾人事业的认识还很淡薄。甚至一些人作庸人之想，认为残疾人问题提得这么响，都是因为有位“大公子”对此事感兴趣。可怜这些人连人类文明的起码常识都不具备：一个国家社会福利事业发达的程度，是其经济发达程度的标志；一个民族对待残疾人的态度，是其文明程度的标志；社会对残疾人的尊重和关怀的程度，直接影响到对每个公民的尊重关怀程度。况且，我们这个泱泱大国中的残疾人就有 5000 多万，5000 万人中又有 1000 多万人是弱智人。再加上他们的亲人家属，相当于几个中小国家的人口了。为如此众多的不幸的同胞造福，使他们的病残得到应有的康复和改善，使他们重新获得生活的希望和快乐，使他们的亲属尽快减轻经济上和精神上的重负，难道不是一桩功德无量的善举么！

我以为，树立人道主义和慈善意识，对我国的社会生活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阶级斗争扩大化”，连年的政治运动，造成了人们难以治愈的心理紧张和人际关系的紧张，呼吁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和睦、友爱，是所有人的心灵之渴望，这也正是《启明星》的主题。由残疾人的处境突出引发的人道、人性、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等问题，尊重人、平等、博爱、人权等现代意识，不仅对残疾人的生存权利有着重大意义，正是所谓“左邻右舍”、“水涨船高”、共同富裕，帮助他人即是帮助自己。

1984 年，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刊物《三月风》，发表了邓朴方的创刊讲话，他顶着压力提出了人道主义的口号。1982 年刚刚因为“人道主义”问题公开批判了周扬，火药味尚未散去，邓朴方几乎是中国大陆唯一敢于又提出这个口号的人。直到几年后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中国残疾人保障法》，他始终旗帜鲜明地坚持：我

做残疾人工作，必须提出这个口号。

邓朴方从不隐讳他是个人道主义者，或许身受不人道的摧残使他深深懂得了尊重人、关心人、体贴人。1985年，社会上出现了“人才热”。他说：“大家都说尊重人才，大都是指‘才’。依我看基础是尊重人，也包括弱智人。只有尊重人，为人的才能发展创造条件，才能出现大量的‘才’。”

他还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提出过更加冒着“离经叛道”风险的见解：共产主义理想是共产党人追求的目标，不能要求每个人都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社会的基础思想，应该包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人道主义。

在改革开放热流中长大的青年人可能弄不明白，当年为何有人对这些美好的口号大动干戈？外国人更会大惑不解，东方文明古国为何对“自由、平等、博爱、人道、人性”等美好的字眼视如大敌？毋庸讳言，邓朴方早在八年前就敢于为人道主义大声疾呼，他在当时的环境下所做的努力不能不令人钦佩。如果人们只管凭着以讹传讹的议论，把一些和他本人关联不大的事情一古脑加在他头上，却忽视了他以独特的号召力为人道主义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似乎就有欠公道了。

5

我也曾相信过那些道听途说，然而，当我亲眼看到躺在床上的邓朴方时，更相信自己的直觉。

邓朴方只有在公众场合时才不得不支撑起坐着，参加会议坐上半天要付出很大的忍耐力。只要像演员一样退到“后台”，他就要躺下来使身躯平展。他有几次躺着和我谈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次是他专程来天津参加《暖流》开机典礼的时候；一次是在1993年6月，《启明星》改编成电影之后，他又专程来津请李瑞环

同志审看影片，于是大家又在迎宾馆二号楼欢聚了。另一次是在杨柳青，当时的天津大学机电分校开设了特殊教育班，首批招收残疾大学生。虽然只有六位盲聋哑学生，朴方考虑到残疾人受教育的普遍水平还很低，这是个很好的苗头，他还是特地赶到了杨柳青。那些盲聋哑大学生对邓朴方能够出席他们的开学典礼非常激动，邓朴方的热情发言给了他们很大的鼓舞，将会对他们和未来的残疾大学生的命运产生良好的影响。

我不知道该如何形容躺着的邓朴方给我的印象，他使我想起了奥斯特洛夫斯基、吴运铎，那些我们在青年时代崇拜的人物。说实话，看到他这副样子，我心中肃然升起的不是崇拜，而是……怜惜和同情。他知道了会不高兴，但我无法掩饰这种大姐姐式的怜惜。其实，我和他同岁，都是属猴，刘小成（中残联副理事长）也属猴。他们给了我这么大的帮助，我送给他们的唯一礼物是每人一只长毛绒玩具猴，因为今年是我们的本命年，朴方说那猴子至今还在他的卧室摆着呢！

在公众场合看到的端坐的邓朴方，觉得他的臂膀很宽，显出很壮实的样子。现在他的躯体陷在软床里，却显得很瘦小，很乏力，很无奈。这个只能在病床和轮椅上度时光的人，没有健全人的享乐，没有子嗣，没有当官的前程，除了必要的医疗保健以维持生命，金钱和权力对他来说几乎没有意义。他只是想使自己活得更更有价值，为社会民众做些事情。而命中注定他会树大招风，和他有些关系的人或压根儿没什么关系的人，为公的人或为私的人，做好事的人或做坏事的人，都喜欢标榜他的旗号。关于传言中的种种误解，他自己倒是姿态超然，朋友们则真盼着智者仁者有个公断。

他自己这么一副身子骨，却对别人富于同情心，照顾别人心很细。他知道我一个女作家充当制片人困难很多，来天津不管应酬多么忙，总是不忘记给我单独会见的礼遇。《启明星》陷入了马拉松式的漫长拍摄，先是拍了四集电视剧；又应中残联要求改编成两集英

文字幕版电视剧，1993年4月朴方和小成把它带到加拿大，在国际残疾人几次会议上展播，受到各国代表的欢迎；然后，我们重新制作配音配乐，把电视剧改编扩印为同名电影。在工序复杂、要求严格的创作过程中，我既要配合好谢晋等老艺术家拍戏，及时为导演提供一切拍摄条件，又要到处奔波筹措资金和物力。剧组“常规军”就有六七十人，群众演员多的场面高达几百人，而且是带着16个弱智孩子拍戏……我成了种种矛盾的焦点。

《启明星》的拍摄新闻已经在全国各地报刊登载，观众翘首以待，同行等着判分，这无异于抽了一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死签”。沉重的心理压力常常使我失眠不安，影视圈里复杂的人际关系更令人厌烦。委屈、急躁、担忧的情绪，往往使我失态。朴方大概听说了什么，一有机会总要把我叫到他的房间，好言劝慰几句，询问拍摄情况，并再三地向我表示感谢。他的这番苦心叫我心里阵阵发热，瞅着他可怜巴巴瘫在床上的样子，同情他还来不及，怎么受得了他反过来安慰我？

6

邓朴方这种体贴别人、关怀别人的温厚善良，在对待残疾人朋友方面尤其突出。他非常喜欢《启明星》里的弱智小演员们，对傻孩子们有着父爱般的深厚感情。见到在剧中扮演小主角晨晨的刘洋，他总是捏捏他的胖脸蛋，拍拍他的圆脑袋，笑道：“来，比比咱俩谁胖！”《启明星》电影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映式时，弱智孩子们抢着他合影留念，记者们团团围住拍照。站在一旁的我发现瘦小的娇娇被又高又胖的牛牛挡住了，忙冲上前一把拉住娇娇往前排送，朴方见状忙说：“哟，别吓着她！娇娇，站到叔叔身边来。”《今晚报》发表的这张合影，所有的人目光都注视镜头，唯有小娇娇扭脸亲昵地望着邓叔叔。我看着这张照片，心里十分感动。剧组的人都把这张

合影叫作“全家福”，因为照片上有几位主要创作人员谢晋导演、主演刘子枫、我和五个弱智小演员，大家簇拥着邓朴方。是的，朴方已经是“启明星家族”的成员了！

《启明星》电影分别在天津和上海举行了首映式。放映电影后的晚上，天津市政府和上海市政府都要尽地主之谊，宴请专程赶来的邓朴方一行和剧组人员，每次邓朴方都特意请求主人把弱智小演员们和他们的家长、教师也请去。于是，在天津迎宾馆和上海锦江大饭店便有了别开生面的晚宴，那真是傻孩子们的盛大节日。往常，这种规格的宴会只能有官员或名流出入，别说是残疾孩子，连普通人也极少有机会出席。傻孩子们轮流来向“谢爷爷”和“邓大大”（天津方言“伯伯”之意）致敬，他们以橙汁代酒，实心实意地一口气把大杯橙汁灌到肚里去，种种憨态逗得宾主开怀大笑，一扫往常应酬场面的拘谨沉闷。我想，这些孩子尽管智力低弱，但他们终生都不会忘记“邓大大”。

朴方这么爱孩子，哪怕是傻孩子他也搂啊摸啊亲热不够。一个内心深处富于父爱的男人恰恰无法作父亲，真是无可奈何的人性悲剧。

朴方的“朴”字，真叫名副其实了。他的品性之朴实、质朴，别说不像高干子弟，就连一般知识分子的孤傲都没有。他的平易近人，在中残联机关内部也充分体现着，工作人员们不分长幼尊卑一律称他为“朴方”。听说关于称谓还闹过笑话，因为他父亲的原因，大家不好叫他“老邓”、“邓主席”，叫“小邓”也有某种嫌疑，还是直呼“朴方”来得亲切。于是，“朴方”也就成了他的官称。

我总爱揣测，他的这种“平民意识”是怎么形成的呢？中残联的朋友们告诉了我许多他的往事……

1956年，他考上北京十三中，这所学校中干部子弟不多，他结交了许多普通人家的同学。50年代，老一辈革命家对子弟要求很严格，每天他骑着一辆倒轮闸的破自行车去上学。困难时期，他和

同学们一起在学校食堂吃饭，喝麦粥，虽然饥肠辘辘，若干年后他仍然回忆说：“最舒服的事是饭后和同学们躺在沙坑里晒太阳。”

在那场政治飓风中他被推到社会的最底层，落入北京清河救济院这个“底层的最贫困的角落”，在这里他结识了一些最不幸的人。10号病室有两个七八岁的孤残儿童，名叫立柱和东风，立柱不仅弱智，腿脚也不利索，东风很聪明但患了小儿麻痹症。朴方自动当了他们的文化教员，给他们讲故事、说笑话。立柱胆小，不敢跑跳，朴方就拿两个小板凳，中间横一根竹竿，鼓励他跳过去，每跳过去一次都给他鼓掌。朴方教东风干些编篮子之类简单的活，还教他下象棋、写字、算术。现在，立柱和东都已是年近30岁的人，东风在中残联所属的康复中心工作。

每年春节，朴方都要回清河救济院一次，带去一些糖果点心探望患难时期的老朋友们。这里孤老病残的人们见到朴方都有拉不完的家当，听说谁谁结婚了，他就高兴得不得了，听说某某老死了，他就伤心叹息……正是这狄更斯小说里描绘过的生活角落，使他对社会底层有了真实的了解。正是由于他保持着和普通入、特别是残疾人的经常接触，才会当好他们的代言人。

虽然命中注定邓朴方不会留下足迹了，但他的轮椅的轨迹已经印满大江南北。全国除了西藏，几乎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他都去过了。每到一个地方，他都去残疾人家里访问，召开残疾人座谈会，倾听大家的呼声，确定中残联的工作重点。

凡是有残疾人的地方，他都要亲自去慰问。中越边界自卫反击战时，他不听劝阻，不顾山路遇上泥石流，硬是让人用滑竿抬着他上了老山前线，看望一个又一个伤病员。截瘫伤员们看到他拖着这么重的残体来到战地医院，感动得号啕大哭，还有什么比同病相怜更为深切的感情，还有什么比榜样的力量更能激励他们生活的勇气呢？！

由于身体状况朴方虽然不能去西藏，但中残联用募集来的资

金作经费组成了医疗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白内障康复治疗的活动。西藏高原阳光中的紫外线很厉害，40多岁的藏民中有许多人患白内障失明了。医疗队在西藏藏山涉水，成功地做了214例白内障剥离手术。重见光明的藏胞激动地高呼：“金珠玛米万岁！”

7

知道了他的经历，我才明白他为什么这般喜欢《启明星》。说实话，他喜欢这个戏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我这个编剧。作为职业作家，《启明星》只是他的作品之一，况且影视剧一向被认为是导演的艺术，有谢晋老前辈的大名，我也知道进退分寸。或许因为我本身缺乏残疾人和残疾人家属的体验罢，缺乏谢导演和邓朴方的那种刻骨铭心的感情。由于工作需要，在剪辑制作、审片、首映过程中，我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看这部影片；看着看着也就麻木了，变得冷静客观很难进入剧中情景了。可是，朴方竟然把《启明星》看了许多遍，竟然每次都看得热泪涟涟，歉疚不止。

最近在总结工作时，我整理了一份邓朴方出席《启明星》活动的材料。别看我对剧情故事早已熟视无睹，面对这张时间表却忍不住涌出热泪：

1993年春节，邓朴方看了四集电视剧《启明星》录像带，认为不错，希望尽快配上英文字幕，浓缩成两集更适合带到国外去播映。

我们采纳了他的意见，剧组人员日夜奋战，尤其剪辑师韦纯葆老先生非常辛苦，赶制两集版本。为了找到好的翻译，我的好朋友，外交部部长助理李肇星和夫人秦小梅，帮了很大忙。

4月下旬，邓朴方和刘小成赴加拿大参加四个国家残疾人会议，在大会上播映了《启明星》，受到各国代表的欢迎。

6月初，影片的“校正拷贝”刚刚出来，他就在家里的邀集亲属先

睹为快。听说他家人看时落了泪，不知是剧情的感染力还是联想到自家的遭遇。

我们非常想知道他父亲看影片的情况，直到这次采访才有机会问他。他说：“本来我很犹豫，因为我总是希望老人家高兴，别看比较沉重的片子。这里面描写残疾人很多痛苦，怕他老人家受不了。后来我反复掂量，觉得影片中虽然反映了社会的落后面貌，并不是多沉重，还是非常向上的，就下决心请他看一看，他看完以后说好。”我笑着打趣：“说朴方抓得好？”他说：“没有。老头说话多简单啊，这就不容易了。”

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巨轮驶入新的航程，大江南北一片欢腾。老人家能够抽暇观看我们的影片，我感到荣幸极了。后来不知从哪里兴起一股谣言，使大家担心老人家的健康。9月19日在天津迎宾馆的晚宴上，大家都向朴方打听。朴方笑道：“没有的事儿！夏天在北戴河老爷子还造了反——下海游泳！”年近九旬的老人还能搏击海浪，我们听了高兴地举杯庆贺。9月22日，邓朴方赴上海参加《启明星》首映式时，记者们问他，他作了如实回答。第二天，《新民晚报》发表了《小平同志最近身体很健康——邓朴方出席〈启明星〉首映式时接受本报专访》的文章，文中说：“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邓朴方昨日下午在上海披露，邓小平同志最近的身体健康状况良好。邓朴方同志是专程由北京抵达上海出席电影《启明星》首映式的。《启明星》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反映弱智儿童生活的故事片，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邓朴方昨天对编剧、导演、主演的辛勤劳动给予很高评价，并称：功不可没。”全国许多报刊转载了这篇通讯，人们对小平同志健康的消息高兴地争相传诵。我更心潮澎湃，孩童一般欢呼雀跃了。这件全国人民都关心的事情，能够借《启明星》首映之机披露于众，我们不仅深感荣幸，还对朴方充满了感激。我们这些艺术家只是为宣传人道主义事业尽了一份职责，谈不上功劳。《启明星》取得今天的社会影响，我

只是运气好，大树底下好乘凉。

6月11日，朴方专程来天津和李瑞环同志共同审看影片，并邀请李瑞环同志出席北京人民大会堂首映式。李瑞环同志对该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高兴地答应出席首映式。

6月12日，朴方又在北京长城饭店主持电影招待会，邀请各有关部委的领导人审看样片，拜托大家帮助宣传发行好这部影片。为了使更多的观众看到影片，他又两次去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拜托胡健总经理和各省市来的公司经理。

7月7日，邓朴方坐在轮椅上于门口迎候，招待李瑞环、丁关根、薄一波、杨白冰、温家宝、陈慕华、陈俊生、洪学智等中央领导同志，电影招待会后，李瑞环同志在座谈时发表了重要讲话。

9月19日，邓朴方又奔赴天津出席首映式。

9月22日，上海首映式……

屈指算来，他看《启明星》足足看了八九遍。在天津和上海的首映式上，前面的仪式结束电影开演之后，我们知道他坐着很难受，都劝他去躺一躺，等电影放完再回来也不误事。他总是表示：“再看看吧！”我问：“看了这么多遍了，不烦吗？”他认真地说：“每次都想看，每次都激动。”

或许是在文艺界泡久了，看的戏剧电影太多了，我的心肠似乎越来越硬，不爱轻易流泪。几次首映式上台和观众见面，我毕竟是领过几次全国奖的作家，也不大当回事。但是，在人民大会堂放映室，电影放完以后，我站在台上看见许多首长都眼圈通红，朴方摘下眼镜擦眼泪，身边的五个弱智小演员五音不全地唱着“世上只有妈妈好……”，我的泪水再也忍不住了。

在上海首映式上，朴方随着上海市领导人上台来和剧组演职员握手留影时，哭得两眼还红肿着。合影时我站在边上，从侧面看到他照镜后面的眼角里泪光晶莹，我的热泪又一次夺眶而出……

上海的少年儿童向我们献了鲜花，朴方上台时，大家不约而同